

關於文化霸權與臺灣文學研究的一個考察

Research on Cultural Hegemony and Taiwan Literature

顏淑華¹ 魏嘉男² 李慧文³

Shu-Hua Yen, Jia-Nan Wei, Hui-Wen Li

^{1,3}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²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1,3}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OC

² Pluralism Lecture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OC

摘要

因著島內外政治局勢的演變、史料的出土、新思潮的引進等因素，臺灣文學史的書寫正方興未艾。其中，挪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與後殖民理論有助於開拓臺灣文學研究的視野。然而，對於所欲操作的理論其產生的背景及應用條件，似乎有必要先予釐清。本文試圖探究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並初步考察其應用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是否妥切。

關鍵字：文化霸權，臺灣文學，後殖民理論

Abstract

Incited by the political evolu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aiwan, given newly unearthed historical data, and according to ideological factors, the Taiwan literary writing is on the rise. The Gramsci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in concert with the theory of colonial impact is helpful in developing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quire into the Gramsci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and applies it to Taiwan literature research.

Key Words : Cultural Hegemony, Taiwan Literature, Theory of Colonial Impact

一、前言

文學紀錄著人民和土地之間的情感文化，生於斯，長於斯，自古以來，對於腳踏臺灣土地、喝臺灣水、吃臺灣米長大的人民，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辛勤奮鬥，與土地產生的情感訴諸於文字的表達，便是在紀錄與創造臺灣的文學，儘管臺灣在歷史上多次被外人入侵，但其人民心中對於土地的情感終究不變，反而因外力的摧殘加入，更加深入

民對這片土地的情感投入。甲午戰爭中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在 1895 年到 1945 年間，臺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臺灣人民被迫接受日本語言與文化。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島田謹二將臺灣文學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 1895 年至 1905 年日俄戰爭期間，第二個時期是 1905 年至 1930 年昭和初期，第三時期是 1931 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時期，此時期臺灣文學

有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由島田謹二的理論架構中可以看到他將「臺灣文學」建立在「日本文學」的延長線上。(註1)

自1920年代發軔的臺灣新文學，至今已有八十餘年歷史。在皇民化時期，臺北帝國大學教授島田謹二曾提出「外地文學論」，將臺灣文學視為是日本文學的一環，黃得時則撰寫〈臺灣文學史〉、〈輓近的臺灣文學運動史〉等予以抗拒。根據陳芳明教授的研究，黃得時的歷史敘述得力於連雅堂的《臺灣詩乘》，而戰後陳少廷與葉石濤的文學史書寫，則是繼承黃得時未竟的工程。(註2)

因著島內外政治局勢的演變、史料的出土、新思潮的引進等因素，臺灣文學史的書寫正方興未艾。其中，陳芳明教授撰寫中的《臺灣新文學史》宣稱將以「後殖民史觀，後結構立場」來建構臺灣文化主體性，當中頗多應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對太平洋戰爭前後島上的統治者加以批判，而且當時「日籍作家企圖把台灣文學視為帝國的一環，而台灣作家則是堅守著『文學一島論』的立場。」(註3)

陳芳明教授試圖從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來建構台灣文學史，他認為「代表不同階級、不同族群的文學，都是建構殖民地文學的重要一環。」(註4)他對於「台灣文學」的解釋如下：

台灣文學是殖民地社會的典型產物，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不斷出現中心／邊緣的緊張對抗關係。居於權力中心的統治者，總是無法自制的要支配居於邊緣地位的台灣作家。同樣的，台灣文學工作者也常常採取各種文學形式向權力中心挑戰。這樣的歷史延續，就不得不使台灣文學成為各方政治力量的角逐戰場。(註5)

而方孝謙的《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雖非屬文學史的建構，但其透過對日據時期善

書、遊記、社論、專欄，以及現代小說的分析，探討殖民地臺灣社會的認同問題，當亦屬臺灣文學研究的一部分。方孝謙指出，在1945終戰以前，日本殖民統治已取得「葛蘭西意義的霸權」；方形容這一霸權是「弱勢霸權」，他並且推論，如果戰爭沒有結束，而日本繼續維持戰時統治型態，則這一弱勢霸權將轉為強勢霸權。(註6)

然而，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所指為何？應用其理論對戰前、戰後至解嚴前的臺灣文學研究是否妥切？這將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

二、葛蘭西文化霸權理論溯源

俄國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後，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立即面臨了以下幾個問題：為何西方的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發生？二十世紀初風起雲湧的工人運動為何失敗？十月革命後所建立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嗎？適合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為何？

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自上個世紀20到30年代，以盧卡奇(Georg Lukács)的《歷史與階級意識》(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為標誌；第二階段從30年代到40年代末，以佛洛姆(Erich Fromm)的《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和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為標誌；第三階段至今則以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的《單面向的人》(One-Dimension Man)和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晚期資本主義理論為標誌。

前述提及，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資本主義危機，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而西歐國家卻連遭失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便努力尋求破解之道。就其關注焦點來看，如果說盧卡奇是從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危機來探討此一問題，那麼葛蘭西則是從國家政權的結構來進行討論，從而開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

葛蘭西認為國家包括「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註 7)而強制力量保障著霸權(hegemony)。因而國家不僅是擁有鎮壓工具，如軍隊、警察、法院與官僚機構等，也涵括意識型態和文化關係、精神和智力以及這些關係的政治表現的綜合體——市民社會；由此構成整體國家。國家在政治社會依靠強制力量，在市民社會則倚賴霸權；霸權係強制與同意的綜合。國家是實際和理論活動整體的複雜組合，統治階級不僅利用它確立和維持其支配，而且還利用它爭取那些在其統治之下人民的積極同意。由於霸權意謂著統治階級對從屬者的意識型態優勢，一旦統治階級取得霸權，則革命即受到阻礙；也就是說，即便發生利潤率下降的經濟危機，工人行動也不見得能導致使得資產階級的政治危機。(註 8)

霸權危機可能產生於群眾的覺悟，而正是覺悟的發展能使危機導致行動。在葛蘭西看來，俄國的國家即是一切，西方的國家則僅是外圍的塹壕，其後矗立著要塞和堡壘等強大體系，因而對國家採取「正面的」、「運動戰」式攻擊，將受到存在於市民社會的霸權抵制，於是，即便奪取國家，也不能建立無產階級霸權。葛蘭西不同於列寧以一個先鋒黨去激發無產階級意識和指導革命，而主張「一切人都是哲學家」，政黨的教育職能應去喚醒工人認識自身的潛能、激勵知識分子，以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為基礎，從事「陣地戰」——建立無產階級霸權，以包圍資產階級國家，而陣地戰過程中所組成的制度與組織，並且為無產階級霸權新的道德與理智的基礎。

三、文化霸權與薩依德的後殖民理論

薩依德(Edward W. Said)對帝國主義進行殖民的剖析，具體呈現在其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當中。薩依德結合傅科(Michel Foucault)的論述理論與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強調東方主義是一種論述形構

(discursive formation)。薩依德指出：帝國主義者經由虛構的東方而與西方產生的差異，然後藉由觀察並論述而再現這些虛構，從而提供帝國主義者殖民東方的理論基礎。在二次大戰以前，法國和英國是主要的帝國主義殖民宗主國；(註 9)此後，這一角色為美國所取代，且以自由主義的面貌出現。(註 10)薩依德認為帝國主義在今日已不再熱衷於以武力擴張、佔領來進行殖民，而慣常以一種普遍性的文化領域，或是特定政治意識型態經濟和社會慣例存在，諸如以文化刊物、旅行考察與學術座談的方式征服後殖民地人民。(註 11)

薩依德認為，東方主義之所以長期存在，是經由幾代人投入一整套理論與實踐，而正是霸權使得東方主義有著持久的耐力和力量。他指出：

葛蘭西對市民社會和政治作過有益的區分，前者由學校、家庭和民間社團這類自願的（或至少是理性的、非強制性的）的聯合體組成，後者由國家機器（軍隊、警察和中央政府）組成，其作用是對前者進行直接控制，在此，觀念、機構和它人的影響不是經由控制而是透過葛蘭西所稱的積極的贊同來實現的。在任何非集權的社會，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獲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權力，正如某些觀念會比另一些更有影響力；葛蘭西將這種發揮作用的文化形式稱為文化霸權，要理解工業化西方的文化生活，霸權這一概念是不可避免的。(註 12)

四、殖民地臺灣有個市民社會否？

由上述可知，援引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不能不同時探究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卡諾伊(Martin Carnoy)指出，葛蘭西之所以不同於列寧革命採用運動戰而主張陣地戰，就在於他認為：

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處於原始和凝膠的狀態；在西方，國家與市民社會存在著適當的關係；當國家受到震

動之時，市民社會的堅實結構就會立刻顯示出來。國家僅是外圍的塹壕，在它的後面矗立著要塞和堡壘的強大體系；毫無疑問，其數量成分是因國而異，而這需要對每一個國家作精確的勘察。（註 13）

葛蘭西上述的說法指出西方革命之所未能成功，就在於市民社會與國家是有明顯區別的。時至今日，無論從任何角度談論市民社會，至少必須明瞭市民社會具有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其古典意義甚且等同於市場，且是一自由市場。國家之所以受到霸權的保護，其因乃是市民社會中的支配階級透過種種社會文化機制，形成市民共識，使全民願意接受既有被宰制的現況。

回到本文的關切所在，方孝謙認為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階段，漢人認同呈現兩極化現象：庶民仍以固有生活方式抵抗日本統治霸權，而知識分子則在強制現代化下認同於日本，他並以周金波的〈志願兵〉等皇民化時期的文學作品為例，說明日本當局在戰前即以取得葛蘭西意義的「弱勢霸權」。

如果說葛蘭西意義的霸權一如前述必須與市民社會聯繫起來始能彰顯其義，那麼方孝謙在談論日據時期文學作品中所透露的霸權現象，就要同時考察此一階段是否有個相對於當時「國家」的自主的「市民社會」？以皇民化時期而言，此一戰時體制尚包括「工業化、南進基地化」兩項政策，單就工業化政策來看，其果真是市民社會自主形成否？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陳芳明教授撰寫的《臺灣新文學史》中。陳芳明教授並未明確定義其謂「文化霸權」、「霸權論述」意指為何，固然陳芳明教授的文學史同樣批判了戰前日本及戰後國府的政治作為，但若欲援引葛氏文化霸權理論，恐怕也需回答在日本殖民時期及國府的再殖民時期，此地是否有個市民社會。

五、結論

陳芳明教授在其著作《台灣新文學

史》的第一章中曾談到重建台灣文學史的問題，他認為台灣島上任何一種文學都能歸到本土文學的行列，包含戰時在台的日人作家們所創造的文學，如西川滿、庄司總一等人的作品都可以放到台灣文學中討論。（註 14）他亦以後殖民史觀的立場來建構台灣新文學史，他將戒嚴時期到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發展定名為「後殖民時期的多元蓬勃時期」（註 15）。所以他以「後殖民史觀，後結構立場」來建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並且大量運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hegemony)理論及後殖民理論來加以批判。

因此，毫無疑問地挪用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與後殖民理論進行論述，實有助於開拓臺灣文學研究的視野。然而，對於所欲操作的理論其產生的背景及應用條件，似乎有必要先予釐清。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中指出，西方對於東方的想像、論述及實踐，乃因其市民社會的霸權作用，且滲透至今日東方曾被殖民國家的市民社會中。關於日治及國府戒嚴時期兩種民族主義的論述形成，甚且一度獲得鞏固的現象，是否就是葛蘭西意義的霸權作用，則有待於日後從事臺灣文學研究時，一併加以討論。

六、註解

註 1：根據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之《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與日本文學的接點》一書譯序中提到：在研究日本統治期臺灣文學的日人中，戰後世代的第一人當推島田謹二，戰中世代是尾崎秀樹，而戰後世代研究臺灣文學的先驅則是河原功先生。臺北：全華，2004 年，頁 vii 及頁 118。

註 2：陳芳明，〈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臺南：「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會議」，1992 年。

註 3：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第七章——皇民化運動下的四〇年代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0 期，2000 年 9

- 月。
- 註 4：陳芳明〈第一章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臺北：《聯合文學》178 期，1999 年 8 月，頁 173。
- 註 5：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錄於《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25。
- 註 6：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1895—1945》。臺北：巨流，2001 年，頁 176-186。
- 註 7：即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
- 註 8：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5-88.
- 註 9：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 4.
- 註 10：Ibid., p. 293.
- 註 11：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pp. 12-13.
- 註 12：Said, *Orientalism*, op. cit., pp. 6-7.
- 註 13：Martin Carnoy,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0.
- 註 14：陳芳明〈第一章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臺北：《聯合文學》178 期，1999 年 8 月，頁 172。
- 註 15：陳芳明〈第一章 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臺北：《聯合文學》178 期，1999 年 8 月，頁 171。
- 善書到小說的敘事分析，895—1945》。臺北：巨流，2001 年。
3.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之《臺灣新文學運動的開展—與日本文學的接點》。臺北：全華，2004 年。
4.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1993 年 6 月；施懿琳、許俊雅、楊翠《臺中縣文學發展史》，1995 年 6 月，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5. 陳芳明，〈黃得時的臺灣文學史書寫及其意義〉。臺南：「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會議」，2002 年。
6. 陳芳明，《臺灣新文學史》。臺北：聯合文學，聯載中。
7. 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4 月。
8. 陳建忠〈發現臺灣：日據到戰後初期臺灣文學史建構的歷史語境〉（《臺灣文學評論》第一卷第一期，2001 年 7 月）。
9. 陳國球、王宏志、陳清僑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 年 3 月。
10. 彭瑞金《臺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出版社（重印本），1998 年。
11.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收入《重層現代性鏡象》第二章）。
12. 黃得時〈臺灣文學史序說〉、〈臺灣文學史第一章——明鄭時代〉、〈臺灣文學史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輓近臺灣新文學運動史〉等四篇（收入《臺灣文學集 2 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出版社，1999 年 2 月。
13.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1987 年。
14.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政

七、參考文獻

1. 「誰的臺灣文學史？」專題論文：黃錦樹〈無國籍華文文學〉（《文化研究》第二期專號，2006 年 3 月）。
2. 方孝謙，《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摸索：從

大中文系出版《臺灣文學學報》第二期，2001年2月）。

15. 廖炳惠，《關鍵詞 200：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臺北：麥田，2003年。
16. 劉登翰等《臺灣文學史》（上）、（下），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
17. 聯合報副刊主編，《臺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國家臺灣文學館出版，2004年12月。
18. Carnoy, Marti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 Edward W.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20.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21. Gramsci, Antonio, "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 in Jeffery C. Alexander, and Steven Seidman, eds., *Culture and Society: Contemporary Debates*. Cambridge,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47-54.